

目 录

1927—1932年高县地下党活动片断……因裕厚(1—15)

1927—1931年高县地下党团的组织

活动(回忆)……李晓南(1—13)

1936—1939年庆符地下党领导的

“南城学舍”的抗日活动……张道亨(1—8)

高縣文史資料

第一輯

高縣政協文史組編

一九八二年十月

目 录

1927—1932年高县地下党活动片断……因裕厚(1—15)

1927—1931年高县地下党团的组织

活动(回忆)……李晓南(1—13)

1936—1939年庆符地下党领导的

“南城学舍”的抗日活动……张道亨(1—8)

1927—1932年高县地下党活动片断

闵裕厚

中国共产党高县党组织创建于1927年的春季，当时全称是：“中国共产党高县党支部”。直接受自贡特别支部（简称特支）领导。是由我县加乐乡人邹永彬回县组建。当时邹在城区第一初小教书。我于1927年4月由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事先填写入党志愿书，我用的化名叫“有余”。在一个夜晚，我在严树田家中向马克思象（是严树田画的）宣誓。当时严树田（字玉生），任党支部书记，李孝廉（字让泉），刘绍修（字润身）任支部委员，邹永彬负责联络事务。当时共产党称“C P”，共青团称“C Y”，我们支部又把党员称读大学，共青团称读中学（这种称号是隐语，对外人是秘密的）。

暑期中的一天（时间记不清）严树田约我一起到加乐乡去会邹永彬。我们没走大路，抄小路，由凉风垭翻九盘坡，经川主庙到邹永彬家。邹从肥料灰里拿出用油纸包裹好的一封信交给严同我看，信上说的是些生意人谈买卖的事，在每行字的空白中是用碘酒涂抹过出现的白色小字，是上级特支的指示：（1）要高县党支部汇报工作情况；（2）建议在地处边陲农村穷困的高县，适时地开展农民运动；要支部仔细研究。我和严树田在邹永彬家吃了午餐后，取道原路回城，已是黄昏时候了。

我们支部党员有：李孝廉（医生），闵裕厚（教师），周树基（职员），袁光汉（字采凡，法专学生），随后又吸收了李孝兰（女，学生，后改名晓南），闵琼厚（女，学生）二人。组织规定：每星期晚上在严树田家开会一次。我们有时开讨论会，分析当前国家的政治情况，并研究国民党的某些措施，有时又开读书会，会上由每人谈谈一周来看书的心得，提出书中不理解章节，然后由大家来讨论，解释。我记得当时学习的书籍有《社会史》、《阶级斗争》、《新青年》等刊物。

我对这些书很感兴趣，《资本论》就啃不动。我们当时的革命生活是处于学习和锻炼阶段。

大约是8月间，支部在严树田家里召开一次特别会议，讨论特委的指示。一致认为上级提出的建议符合高县的实际情况，同意开展高县农民运动，并决议召开包括有进步青年参加的一次扩大会议，以壮大党组织的革命阵容，加强开展农民运动的力量。这时，适逢罗场阳本江（此人系阳堡近房兄弟，同情革命），将于10月间结婚，于是会议就决定在这个时间大家到阳家借吃喜酒为名，以掩护扩大会议在该地召开。按期前往的城区有严树田、李孝廉、刘绍修，罗场有刘秉刚、阳本江，高鹏九，羊田有肖同光、龙世顺，蕉村有罗孝庆、钟守常等。会议很秘密，时间选择在阳本江结婚次日的午后，装着出场游玩，首先走到土主庙参观，就在庙内开会。会上，李孝廉、袁承凡相继发言大意是：要求大家多看马克思著作和进步书刊，要有正确的认识，要信仰马克思主义，要拥护中国共产党，要同祸国殃民的政权作无情的斗争。最后严树田提议：“开展高县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”。提议受到全体赞同，顺利通过。罗场农民觉悟较高，决议罗场为开展农运的基地。刘秉刚家住农村，具有农民身份，又是有知识的进步青年，一致推荐他负责领导，工人运动，因芭茅坡亦有砖厂，工人较多，决议以芭茅坡为运动目标。蕉村离芭茅坡较近，蕉村人在砖厂做工的很多，遂指定蕉村为工运基地。因无适当人选，而未举出负责的领导人，暂由罗孝庆、钟守常分别活动。那时我在二小教书，此次会议没有参加。会议情况是寒假回县严树田详细告诉我得知的。我问：“邹永彬怎么未参加？”严说：“邹不愿在众人场合中暴露自己”。但会议情况将通过永彬转报上级。

罗场的农民运动最初很顺利，在两三个月内就组成了几个农协。因刘秉刚求成心切，暴露了行动目标，被本乡土劣发觉，受到严厉监视。

后来又受到场上土豪劣绅的警告，使运动无法进行。

芭茅坡的工人运动，因无专人负责，罗钟二人又工作不力，效果毫无，成为决而未行的运动，回忆起来深感遗憾。

1928年5月，上级（特支）派来一个视察同志名叫蔡涛的，在严树田家召集“县支”开了一个临时会议。这次到会的有周树基、李孝康、刘绍修、闵琼厚、严树田和我。会上，他听取了严树田的工作汇报后，随即讲了一些当时的政治情况，鼓励大家积极工作。他指示了两点：1. 当前白色恐怖严重，要大家提高警惕，作好战斗准备；2. 要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，抓住机会给以有力的回击。他的讲话对我们下半年捣毁“县党部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
1928年是蒋介石背叛革命，大肆屠杀我党地下党员的最黑暗的时期。国民党中央由吴稚晖等发起“清党运动”，妄想把我党安插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清洗出来，加以迫害。四川省国民党党部根据这一“运动”，在全川各县成立“党务整理指导委员会”。接管原县党部职权，俟党务整理后再恢复旧称。高县“整委会”由四川省党部委派秦仲英、何月生、谢寅初、涂以学、段瑞等五人组成。秦仲英任书记长兼要害部门的组织部长，陈静修任总干事，单少基任干事，陈文治任文牍，向仁圆任财务。这些委员都是亲身^{赴省}钻营、贿赂得来，并于同年秋季在高县正式成立组织。

此时，我与严树田同在一小教书，严任监学兼教体育、图画、手工、音乐四科，我教公民、自然、卫生。校长吴杰臣是高县国民党的头面人物，也是旧势力的代表。几年前高县就有新老两党的派系之争。老党的代表人物有：周舜聪（教育会长，商会会长），吴杰臣（教育会副会长），吴云光（农会会长），何以章（商会副会长），涂以学（实业局长），孙玉珊（收支所长），江绍儒（前属视学），等。

新党的代表人物有：秦仲英（国民党组织部组织部长），何月生（县党部宣传部长），谢寅初（县党部执行委员），陈德修（党部总干事），单少基（党部干事），杨镜光（县府行政科长）等。两党为了争权夺利，经常发生磨擦。此次新党独霸“整委会”这个重要组织，使老党感到不安，引为隐忧。

我县国民党“整委会”成立后，大肆宣扬要彻底整顿党务，清洗党内的共产党分子，追查嫌疑人士。这使老党受到严重威胁。该会宣布要每个国民党员前去申请登记，填写表册，听候审查。凡他们认为异己份子的则不准登记，不发填表。周舜聪于此时告我，他从涂以学口中得知，秦仲英已拟就黑名单，许多青年都遭到迫害，我同严树田则名列前茅。若去登记定遭拒绝。其实周舜聪不知我同严树田虽是国民党员，早把这个臭招牌看得一钱不值，不准登记毫无顾虑，问题在于今后会发生一些问题。为了党组织，为了其他青年们，也为了自己，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对付敌人——“整委会”这一挑战。于是（农历10月半间）严树田在家召集支部党员李孝廉、刘绍修、周树基、闵琼厚及我开一次应急会议（此时李采凡在成都志城法专读书，李孝兰被派到外县工作）。研究敌人将要采取的行动和新老两党目前的矛盾程度。到会的人都情绪激昂，纷纷发言。总共得到三点共同认识：1、新党夺得“整委会”，老党深感不安，双方矛盾更见尖锐；老党为了维持本身权利，定会想法对付；2、认清国民党“整委会”是我们的死敌；3、老党只争权利，同我们没有权利的冲突，我们就可以利用他们；本此三点基本认识，当晚会议决定：“联老抗整”（又称“联老反新”）的方针，但对如何‘联’，怎样‘抗’，无人提出具体办法而结束了会议。

会后几天，逢逢邹永彬有事来城，当晚我们又在严树田家续开会

议，到会的除了上次的人而外，增加了邹永彬。会上专门讨论“联老抗整”的具体方案。当时我想到前次蔡涛的指示，“要抓住时机给敌人以有力的回击”。我提出捣毁敌人巢穴——县党部“整委会”的建议。我说：“如果成功，党组织可不受威胁，青年们免遭迫害，还能降低国民党在群众中的威信”。周树基首先表示赞同，刘绍修说我是冒险，后果堪虞。我说：“这是勇敢而不是冒险，敌人已经找上门来了，我们应该打狗于门外，不能闭门待毙”。记得当时我还用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”一句成语来加重我建议的分量。严树田问：“后果呢？”我说：“后果不用问，我们要的是胜利；只要得到老党的合作，问题就不大，除了这样做，实在没有别路可走了；如另有更好的办法我无意见”。邹永彬听后立即同意，严亦随表赞同。我的建议遂一致通过。会上随即分配任务：我和周舜聪交情较厚，指定我同他联系，要他支持我们的正义行动，还要他说服老党一起支持。严树田为吴杰臣所信任，指定他去鼓动吴杰臣出来“领导”打党部；周树基是实业局局长涂以学的书记，指定他去劝涂，要涂坚持老党立场，不要卷入国民党新党的漩涡；由于涂与新党的一些人较密切，还要涂向我们提供“整委会”的内幕。我们三人根据组织的决定，分别接受任务。从此时起（10月中旬至冬月24日）至打党部的当天止，我们的心情是紧张的，工作是忙碌的，联系是频繁的，行动是慎密的。我们三人随时碰头交换情况，按时向组织汇报。好不容易同老党经过多次艰难，曲折的陈述利害的劝说，又经多次反复仔细的协商，吴杰臣愿意作打党部的发起人，他还进一步联络江绍儒等人参加。周舜聪不但支持，还替我们联络团练局局长罗玉慈提供消息，保持中立，不用武力干涉这事；涂以学表态，绝不背叛老党立场，愿意尽力协助。我们的联络取得圆满成功，只等伺机行动。

冬月20日左右，涂以学向周树基透露，他们党部要在23、4、5三天连续召开“整党设施会议”，将由组织部长秦仲英提出《整党方案》，同时周舜聪告我，罗玉葱对他说，刘云久县长将于24日动身下乡（高县所属沐爱一带地区）出巡，要罗注意冬防治安。这两个消息凑在一起，对我们极为有利。我们估计国民党人将于会后采取恶毒行动了，我们要争取时间抢在敌人先头，实现我们的计划。刘云久出巡将大大减轻我们的压力，这是个不可放弃的好机会。于是在我们行动前几天的一个晚上，党支部又在严村田家召开一次紧急会议，经过反复讨论研究，决定于24日（农历冬月）把我们捣毁国民党“整委会”巢穴，破灭他们的阴谋措施付诸行动。我们选择这天的理由是：24日是农历双日赶集日期，农民特多，可在农民群众中造成对我有利的影响。又因赶集人多，“打手”们事后容易疏散，混入人群不易发觉；又刘已出巡，不在县中，给他有词推卸责任的余地，而又不损伤他县长的“声誉”。

日期决定后，由我们三人（严、周、周）分头通知老党，征得同意。吴杰臣提出要我们替他找批“打手”，周树基找一批，吴本人自找一批，江绍儒在家乡仁爱找一批。我在城乡找的人有我的弟弟周光厚和好友杨炳云（织布工），何炳兴（皮匠），付正钦（青年）。周树基在黄水口找的有叶文富、王德全、康光文、周治平。吴杰臣找的是一批青年“袍哥”。这三批人全由吴亲自率领。江绍儒在仁爱找的一批农民由他本人率领，定于农历冬月24日正午在城中心米市（现人民政府门前厂坝）会齐，然后冲击党部。

24日上午，吴杰臣身披呢绒大衣，手提木制双钩，带领三批手持不同器械的打手，于正午同约定的江绍儒率领的二十多名青年农民主力，均执青杠棒，在约定的米市会齐后，浩浩荡荡直奔国民党党部

“整委会”，乘他们开会之际，一哄而入，高声大喊：“打恶人！”党部委员们见状惊慌失措，四处奔逃。秦仲英逃至望江楼下，被仁爱农民追上，乱棒交加，打扑地上，双手抱头，大声呼叫。其它委员有被打者，这是事先约定。只许打秦仲英一人，以免事态扩大。于己不利，致其它委员均得无恙。打手们冲入党部时，首先砸烂“中国国民党四川省高县党部整理指导委员会”这块臭招牌，打破它前门窗和会议室、办公室、文卷柜，取走部份文件。

其时，我们在严树田家等候消息，开始时，我身藏短铁棒一把，约严树田沿城墙小路，从党部后门进去。严于半路折回去联络。我独自自由后门走到望江楼时，见秦仲英已被打伤，我无心观看，径直奔到他的寝室，搜寻秘密，在秦的衣箱内，搜得县党部组织部图记一摺。我由后门走出时，见秦气息奄奄，卧卧原地。这次捣毁县党部，人们不知道城里发生什么大事，街民惶恐不安，农民纷纷离城，市场发生骚动。得知是国民党部被打时，民心才安静下来，赶集如常。此即轰动全高县的捣毁国民党县党部事件。

国民党人惊魂稍定后，力求县府派员为它搜捕“暴徒”，县长代理举棋不定。此时迹象表明，对我们大有不利。当天下午，我同严树田先后到达实业局暂作隐蔽，涂以半劝我们离开县城，看今后事态发展情况再作打算。我同严接受了他的劝说，于是日夜半从该局后门逃经泥田到下渡口叫船过河至庆属怀远。当夜宿于杨锡侯油房。次日（25日）正午接得周树基来信说：今晨县府照壁上发现“建立苏维埃政权”等形形色色的标语。这当然是国民党人搞的阴谋，其用意是置我们于死地。委员何月生直向县府指控，说我是阳番堂表弟，受匪指使，在县友起“暴动”，并说，县府已准国民党人之请，令团长罗玉杰派队搜捕“暴徒”，罗顶不住县府和国民党人的压力，已

队四出逮捕了江绍儒，叶文富，康光文，闵治平等四人。秦仲英伤势严重，迁住县府医疗，藉求保护。吴杰臣被扣留于县府，情况严重。要我与严离开怀远。于是我和严翻山越岭至郭家铺，经石龙，过三溪观，绕庆符县城，至西江寺过河，到白家庄严旦夫家暂住。随后不断接到周树基来信，言前被擒之人，均已入狱，惟吴杰臣得收支所长孙玉珊力保，未被收禁，准其回家候案，现已秘密离高县赴省。我同严考虑今后安全。经过商议，我们决定远走成都。严于腊月初旬先走，我于中旬也跟着去蓉。次年正月，周树基也到成都。半年后，我们被捕的人（江、叶、康、闵）相继出狱，我同严树田则遭国民党开除党籍，通令缉拿。

1931年春，我怀着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”的心情，从省返家，省视孀母，其时，高县党部已正式恢复。新党的秦仲英，何月生仍掌握伪党部的大权，并还各养了组织部和宣传部长。老党周舜聪，吴杰臣、吴云光、何以章、涂以宇、孙玉珊等仍占据教、农、商（高县历来无工商会）等法团及财务局、收支所两机关，新老两党于是又各据地盘，窥测方向，伺机“吃掉”对方。

这时我党支部，已由李孝廉领导。寒采凡亦由志城法专毕业返县在一小教书，刘绍修在城区初小任教。李孝廉仍然行医，闵琼厚无力升学，闲居家中。2月的一天夜晚，支部召集大家在李药店后面一间小屋里开会，由李汇报工作情况，他说：“自从打党部后，严、周、闵三人外出，工作困难，我们只能在自学方面加强努力，同各乡进步青年取得密切联系，在他们中间发展组织。罗场的刘秉刚，阳本江已被吸收。不幸联络人邹永彬上年游泳溺死，支部从此与上级失掉联系工作无法进展。寒采凡会上的发言说：“我们的联络人已死，同上级失掉联系是事实，工作困难，是意料中事。但我们的工作应继续干下

去，只靠我们单独作战，收效不大。”他建议：“要我们都管一个实权职务，或打入一个重要行政部门，取得一个合法身份作掩护，以便公开活动。借其职权，保护党的组织，还能探得一些县府机关的机密。”窦的建议很受欢迎，大家知道我与老党曾有联系，我读中学时的老师邓玉珊（宜宾人清朝拔贡），现任县府秘书，由我去进行工作较有希望。于是会议决定我去完成这项任务，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。

经过反复考虑，我选择了既能亲近人民，又常接近政府，而又不拘“礼仪”，随时进出县府面会县长，又能管理行政并兼司法（与人民解决纠纷）的城区“团正”这个职务为活动的目标，此事得到老党教育会长周舜聪的推荐，老师邓玉珊秘书的力保，县长杨愚的委任。消息传出后，国民党人大为惊恐，认为我对他们又将不利，反对我上台。先由他的同党行政科长扣下委任状不发，再由该党委员陈蔚修，干事单少慕，女校校长李淑芳等以城区居民名义，用“少不更事，贫无立锥”为理由具文呈县府，反对我出任城区“团正”，又唆使前任团正田燕林不办移交。国民党人采取的一系列措施，都经我们各个击破。4月份我正式到职，胜利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。当时组织指示，要我在职权范围内办些有益于人民的事，以取得人民的信任。同志们鼓励我要好好地干。我到职后，即把团务办公室“讲理信”（为人裁判纠纷）时，原被告双方各出市钱一串（每串相当于人民币壹元，此钱由团正甲长平分）的陋规废掉。随后我又托词以城区无办冬防的必要，把本团一年一度招募团丁40名，保卫治安3个月的冬防惯例废掉。使人民每年少负担三个月捐款。这事虽微不足道，但在当时那个职权内，仅能做到这样。

9月的一天，我在米市场上发现一张“高县教育促进会”的通告，大意是：“为促进高县教育事业的发展，为了帮助青年求得丰富的知

只，建立“高县教育促进会……”，呼吁各界人士广大青年积极报名参加。通知末尾署名会长段植农（此人后来任高县县党部书记长）。这时，我很惊异这个会的产生，段刚从法专毕业回来，为什么急于搞出这个组织，其动机何在？目的何图？须得弄清。我请李孝廉来我家召开支部会议，大家来分析他的来龙去脉，会议指派梁采凡去作调查，梁同段是法专的同学，不几天就把“教育促进会”的内幕了解得一清二楚。随即又召开会议，听梁采凡汇报情况，他说：“段植农告诉他是何月生再三要他搞的”，何对段说：“如果他们党部出面来搞，定遭老党“教育会”的反对，即使搞成了也只能算是党部领导下的一个组织，不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独立团体，作用不大，若由段去建立，可以减少老党的注意，并可把青年们拖到我们这方面来，扩大我们的力量，名义上是社会群众团体，实际上可以同原“教育会”分庭抗礼。并向段表示：从财力、人力、政治等方面大量支持，段因情面难却，才答应下来”。这下我们清楚知道这个“教育促进会”产生的背景，我们决定仍利用他们之间的“狗咬狗”的矛盾来摧毁这个组织。

我把段植农说的情况告知老党的周舜聪，吴杰臣（教育会正付会长）他们大为愤怒。我提出将用城区“团正”名义具文县府，解散这一非法组织。呈文大意是：“查职属城区，近日发现奸人，非法组织高县教育促进会，私刻图记，散发通知，鼓动青年报名参加，对社会治安，恐将不利，请明令立即停止活动，以遏乱谋……”。二人非常高兴，立表赞同，他们愿意以教育会长的身份，面会县长沈洪曾，提出同我一样的请求，为了统一步调，各自分头进行工作。县长沈洪曾对我相当信任，呈文递上不久，得到“准如所请”的批示。县府随即张贴告示，解散这一组织，并飭令该会负责人段植农“销毁图记，上报被毁”。于是国民党人妄图把持教育界，扩大势力的阴谋彻底破产了。

本年腊月的一天晚上，支部又在我家开学习会，我提出让李孝廉出任城区“团住”为我助手，代我主管“讲理信”工作。我的建议得到支部同意和李允诺，由我向沈保善，这一请求顺利被批准，委任状亦随文发下，李于腊月正式到职。

“高县教育促进会”被瓦解后，何月生等并不死心，又于1932年2月秘密筹组“高县工会”。这消息我于无意中得知。我请来翻房的垅工曾德清同我吃饭时向我说：“你那天来请我做工，我到县党部开会去了，没在家，县党部要成立工会，要把我们各行业的工人都组织起来。”我问：“有哪些人去来”，他说：“你对门的兰木匠，剪头的卢吉成都在场”。我又问他：“你们会见了哪些人？”他说：“党部的人多，陈委员，（静修），单干亭（少霖）都给我们讲了话”。我又问：“他们说些什么”？曾说：“他们要把我们工人组成各个工会，帮我们谋幸福，做好事，免得受穷受压迫”。我又说：“你们工人能自己组织起来倒有力量，再大的困难都能解决，谋本身的利益是对的，就怕县党部不是真心诚意在帮助你们，他们平素办过一件好事吗？瞧得起你们吗？你们不要上当啊！”曾说：“以后看嘛”。过了两天我走访了兰木匠和理发师卢吉成，他们说的与曾说的大体相同，我把探得的情况向李孝廉汇报，他约了龔采凡在我家研究国民党人这次暗地组织工会的企图。

研究得出的结论：1、认为此次国民党人暗组工会的动机是乘当时高县仅有教、农、工三个法定的人民团体，独缺工会之际，秘密把工会组成，便不会遭到象“教育促进会”那样的解散。但他们又不敢名正言顺公开组织，因为国民党自1927年背叛革命以来，早把孙中山先生亲自制定的三大政策（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）抛诸脑后，敌视工农，已为全国工人所不齿，工人群众对它失去信仰。如果他们公

开出而组织工会，一定得不到工人的同情和支持，因此，只好暗自秘密进行工作，一俟组织就绪，随意指定一人负责，报请县府批准立案，就可正式同现有的教、农、商并立，成为一个合法的社会独立团体，争得在县有投票权的资格，为他们争权夺利创造条件；2、工人运动是我党的中心工作，以前芭茅坡的工运没有成功，就是我们的一次深刻教训；这次我们应该掌握时机，不能放过机会，任凭敌人愚弄工人，达到他们不能告人的目的。我们要同他们作坚决斗争，把组织权夺回来，达到我党^为工人谋幸福的愿望。蹇采凡主张再利用一次老党。这次国民党暗组“工会”比组织“教育促进会”对老党的威胁更为严重，蹇要我去找老党并利用教、农、商团体会长名义，向县府倡议，成立高县工会，以符合每县四法团的规定，并建议由他们推选我担任筹备工作。老党为了解除国民党人对他们的威胁，定能同意。这个办法李孝廉和我认为可以，随即又在我家召开支部会议，由李把上述情况和采取的对策说明后，刘绍修、闵琼厚都无意见。于是决定任务交我去执行，这时大约是2月中旬左右。

以后，我分别会见三法团的会长周舜熙，吴杰臣、何以章、吴荣光等人，告诉他们何月生等暗中组织“高县工会”的情况，他们深感不安。我向他们建议：如果不使工会组织落入这些人手中，最好由三法团联銜具文县府，倡议重新成立县工会，并推荐我负责筹备工作，把工会大权夺回，消除何对他们的威胁。我的建议老党基本同意，并叮嘱他们要尽快进行工作，争取时间，抢在何月生还未公开活动之前。三法团的呈文递去不几天，县长沈曾又^朱“准为所请”正式委任我为“高县总工会筹备会”主任，涂以学为付主任，委任状下达后，照例呈报筹备会成立日期，启用图记，张贴通告，聘请蹇采凡任筹备会文牍，并调得力甲长廖南轩、邓云章、惠占富、谭松泉四人为干事。并把该

会的吊牌挂在县府大堂外，使何月生等的计划又一次破灭。当时四川还处于防区制，县长职权特大，何等国民党新派对我们筹组工会虽感不安，但慑于县长权威，不敢非议，只好采取妥协，托我姐夫李云涛说情，县党部愿同我们合作，共同组织工会。我对李说：“我是奉命筹组工人群众的团体，无权与别人搞合作。”拒绝了他们的请求。我知道他们不会就此心死，仍要另玩花招，于是我把筹备工作加紧进行，并派出廖、邓、惠、谭四个干事负责组织泥、木、石、屠四工会，派杨炳云组织织布工会，^{何炳兴组织修鞋工会；周球厚组织缝衣工会；}包海青组织理发工会；李孝廉组织医师工会；我组织教员工会。又随时约集各业工人到团务办事处谈话，我和李孝廉不时又去走访工人。何等见协商失败，我的筹备工作进行顺利，于是便采取破坏手段，在工人中散布谣言，企图瓦解工会的建立。我们随即采取措施，进行辟谣。

4月中旬，筹备工作已近尾声，各工会纷纷宣布成立。各会代表如期选出。理发工会代表包海清，泥工工会代表曾德清，木工工会代表兰掌墨师，屠业工会代表惠占富，修补工会代表何炳兴，织布工会代表杨炳云，缝衣工会代表周信厚，医师工会代表李孝廉，教员工会代表周裕厚，还有其他各行业的代表姓名记不清了。

他们见工会即将成立，又托李云涛再来转达，谈县党部要求派两个人加入总公会理事会。我对李说：“总工会的人选应由各工会代表本其意愿投票选出，别人无权支配，如把个人的意愿强加于人，且不成了包办选举？”再次拒绝何月生等企图打进工会的企图。

4月20左右，筹备工作已圆满就绪，发出通知，定于25日上午10时在高县县府礼堂召开“高县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”选举高县“总工会”理事，成立“高县总工会”。会前一天在“筹备会”办公室开了一次预备会，会上我向代表们报告成立“总工会”的意义和第

二天选举的程序，并向代表们推荐几个候选人的姓名，由代表们选举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人，会议达到预期的效果。

2.5日，各工会代表齐集会场，无一缺席，筹备会还邀请县长沈洪曾蒞临指导。会议由我主持，会上我先报告筹备经过，再按会程选出“总工会”理事，到会代表相继发言，随即讨论人选问题，互相交换意见，经过充分酝酿，由“筹备会”散发选票，指定涂以学为监票员，龔采凡为唱票员，刘绍修为代书员，选举结果：吴杰臣、涂以学、周泽敷、闵裕厚、李孝廉五人为理事，负责成立“高县总工会”。会议顺利结束。

次日正式成立“高县总工会”，推选吴杰臣担任“总工会”理事会的理事长。

同年6月，严树田从外地回来，同志们都很高兴，认为组织又增加了一分力量，严于下期任教一小。冬季期间，（时间记不清）我们的组织不幸被判徒吴晦庵（浑号吴瞬子）出卖，（吴宜宾人，与严曾有联系），他到县府揭发严是高县的共产党员，县府遂将严拘留于“团务委员会”以待处理。当时我县政教界进步人士纷纷设法营救，教育界从舆论方面为严减轻压力，政界的农、工、商人士向县府有关部门代严呼吁，（当时营救最力的是一小校长周开镛同志）。后来听说由严树田发表“退党”声明而得释放，旋即李孝廉，刘绍修也相继声明“退党”，他们三人的声明我未见到，尤其是李，刘退党是被严树田所逼，抑或出自自愿，至今我还迷惑不解。

我党的地下党支部自遭破坏后，龔采凡亦于是年1933年1月远去珙县罗星渡他父亲盐店工作，闵琼厚又出嫁庆符，我亦于次年2月辞去“团政”职务，到高县加乐四小教书。从此，我县地下党组织遂陷于停顿，现在回忆起来深感痛心。